

第八卷

Zhongguo Lishi Zhuming
Wenxuejia Pingzhuan

中国历代著名

文学
家
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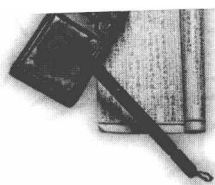


第八卷

吕慧鹃 刘波 卢达 编

中国历代著名

文学家
手评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第八卷/吕慧鹏, 刘波, 卢达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5328 - 6196 - 5

I. 中… II. ①吕…②刘…③卢… III. 作家—评传—
中国—古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5031 号

目 录

柳 开	朱靖华	屠建业 (1)
林 逋	乔象钟	(17)
张 先	宛敏灏	邓小军 (23)
宋 祁	朱靖华	屠建业 (36)
苏 洵	吴文治	肖 今 (51)
司马光	刘乃昌	(65)
苏 辙	刘乃昌	(73)
贺 铸	王松龄	(79)
陈师道	莫砺锋	(95)
晁补之	刘乃昌	(103)
张 耒	金性尧	(112)
叶梦得	潘君昭	(124)
朱敦儒	沙灵娜	(132)
吕本中	谢思炜	(145)
陈与义	白敦仁	(154)
胡 铨	王士博	(171)
朱 熹	蔡厚示	(182)
刘 过	王从仁	(200)
史达祖	缪 钺	(207)
赵师秀	张宏生	(222)
王若虚	张伯伟	(232)
董解元	姚莫中	(242)





朱淑真	金性尧 (249)
刘克庄	张忠纲 (260)
刘辰翁	王士博 (273)
周 密	陈邦炎 (283)
王沂孙	叶嘉莹 (298)
卢 挚	李修生 (316)
谢 翱	邱鸣皋 (325)
刘 因	邓绍基 (339)
赵孟頫	霍松林 张学忠 (349)
刘 致	孟繁仁 (358)
郑光祖	吴文治 焦雨石 (372)
张养浩	黄祖良 (378)
康进之	张忠纲 (392)
乔 吉	姚萸中 姚力芸 (396)
贯云石	冯钟芸 (404)
徐再思	万云骏 (413)
王 冕	范 宁 (419)
朱 权	夏写时 (428)
朱有燬	李 平 (442)
于 谦	尹龙元 (454)
李东阳	邓绍基 尹恭弘 (468)
王 磐	丰家骅 (479)
唐 寅	金性尧 (489)
李梦阳	章培恒 陈建华 (500)
康 海	刘致中 (512)
何景明	郭预衡 (524)
杨 慎	贾炳棣 (539)
李开先	黄秉泽 (552)
唐顺之	刘季高 (568)
徐 渭	袁震宇 (582)

汪道昆	金宁芬 (596)
沈 璟	魏同贤 (608)
王骥德	袁震宇 (621)
袁中道	陈毓黑 (635)
钟 惺	吴调公 王 恺 (646)
阮大铖	王永健 (661)
张 岱	尹恭弘 (680)





柳 开

（公元 948—1001 年）

朱靖华 屠建业

柳开，是北宋初年的散文家，北宋古文运动兴起的先驱者。时人对他的评价很高，如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云：

懿僖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

《宋史·梁周翰传》有云：

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昉、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

据此，柳开在纠正五代至宋初以来的“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见牛希济《文章论》）的华靡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方面，具有开拓之功。研讨北宋古文运动和其历史作用，柳开是一位毫无疑问的筌路蓝缕者，故他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柳开的生平

柳开，字仲涂，自号东郊野夫，又曰补亡先生。公元 948 年即后晋出帝石重贵天福十三年，生于大名（今属河北省）的一个官宦家庭中。其父承翰，是宋太祖乾德初年的监察御史。柳开一生基本上是在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灵的两朝中度过，宋真宗赵恒即位才刚四年，他即因病故去了。在柳开生活的这五十余年



中，北宋正处在建国初期的“精通治道”（宋太祖谋臣赵普语）、消除割据、改革政治、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时期；同时又是整个封建社会趋向走下坡路而充满社会矛盾的历史时期。政治上的思治，孕育了文学上的变革要求；社会的矛盾，也影响了文学变革的复杂历程。

柳开勤奋好学，尤酷爱经史礼义之书，并喜与友人讨论经义之情理。在他长期的习文治学过程中，对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深恶痛绝，决计以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传统为己任。为此，他两次改易名字，勉励自奋。柳开原名肩愈，字绍先，意谓肩韩愈而祖绍柳宗元：“因为文直以韩文为宗尚，……遂名肩愈。”（《河东先生集》卷十六，附张景《柳公行状》）“复以绍先字之，谓将绍其祖而肩其贤也。”（《河东先生集》卷五《答梁拾遗改名书》）不久，他又改名“开”，字仲涂，进一步标明了他“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达于孔子者也”（卷二《补亡先生传》）的宏图抱负。

柳开在文学上的披坚执锐、敢于创变，是与他的见义勇为、恃才傲物的传奇性格有关。

柳开自幼聪颖奇慧，胆识智勇超人。“周显德末，侍父任南乐，夜与家人立庭中，有盗入室，众恐不敢动，开裁十三，亟取剑逐之，盗逾垣出，开挥刃断二足指”^①。

青年时代的柳开，血气方刚，好任侠，“尚气自任”，与其来往交游之文友佳朋，“皆一时豪杰”。又：柳开“性倜傥重义。在大名，尝过酒肆饮，有士人在旁，辞貌稍异。开询其名，则至自京师，以贫不克葬其亲，闻王祐笃义，将丐之。问所费，曰：‘二十万足矣！’开即罄所有，得白金百余两，益钱数万遣之。”又据吴处厚《青箱杂记》记载：“柳崇仪开，家雄于财，好交结，乐赍施。而季父主家事，靳不与。时赵昌言方在布衣，旅游河

① 《宋史·柳开传》。以下凡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出《宋史》本传。



朔，因谒开，开屡请以钱乞赵，季父不与。开乃夜篝火，烧舍，季父大骇，即出钱三百千乞赵。由此恣其所施，不复吝。”（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四引）

开宝六年（973），二十二岁的柳开考中进士。在求取功名的科举道路上，“柳开好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下，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衣襦自拥车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称赏，擢优等。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见沈括《梦溪笔谈》）

柳开举进士之后，补宋州司寇参军，表现出优异的从政才干，“以治狱称职，迁本州录事参军。”太平兴国中（980年前后），柳开被太宗赵匡义擢拔进京，任右赞善大夫。他步入朝廷之时，正值宋太宗率军北伐，灭北汉并试图收复被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之际。在征讨太原的军事行动中，柳开受命“督楚、泗八州运粮。选知常州，迁殿中丞，徙润州，拜监察御史。召还，知贝州，转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985），因柳开的恃才傲物，与监军不和，被贬为上蔡令。早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匡义亲率大军北征，柳开率部运送军粮将到达涿州时，适遇契丹酋长带领一万骑兵与宋将米信接战。两军对垒，相持不下。时间不长，契丹军忽遣使者来米信营中求降，柳开当即看出契丹酋长之险诈用心，而对米信说：“兵法云：‘无约而请和，谋也。’彼将有谋，急攻之必胜。”但胸无城府、少谋缺略的米信“迟疑不决。逾二日，贼复引兵挑战，后侦知果以矢尽，俟取于幽州也”。班师回朝之后，柳开即向宋太宗上书，要求留守边关，以报效朝廷，赵匡义爱惜柳开的才干，再授柳开为殿中侍御史。

柳开不仅勇猛有谋略，而且生性刚强，嫉恶如仇：“柳仲涂开知润州，胡秘监旦为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警于时。旦造《汉春秋编年》，立五始，先经后纬，发明凡例之类，切侔圣作。书甫毕，邀开于金山观之，颇以述作自矜。开方拂案，开编未暇展



阅，拔剑叱之曰：‘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语讫，勇逐之。旦阔步蹶衣，急投旧舰。锋几及身，赖舟人拥入，参差不免，犹斫数剑于舷，聊以快愤。”（见《宋人轶事汇编》引释文莹《玉壶清话》）

柳开一方面积极维护儒道名教，另一方面却在生活上放浪不羁，“不拘小节”。如同在润州任上，“有监兵钱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属也。乃父方奉朝请至京师。开乘间来谒，造其书阁，见壁有绘妇人像甚美，诘以谁氏？监兵对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开丧偶已逾期，愿娶为继室。’钱曰：‘俟白家君，敢议姻事？’柳曰：‘以开之材学，不辱于钱氏之门。’遂强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礼。钱不敢拒，走白其父，乞上殿面诉柳开劫取臣女。太宗问曰：‘卿识柳开否？’曰：‘不识。’上曰：‘真奇杰之士也。卿家可谓得嘉婿矣。吾为卿媒，可乎？’钱父不敢再言，但拜谢而退。”（见宋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引张师正《倦游杂录》）此事遂被当时人传为趣闻。

柳开热心朝政，敢言直谏，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

雍熙中，使河北，柳开颇不如意，乃犯颜“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报，年裁四十，胆力方壮。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上以五代战争以来，自节镇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晓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郑宣、户部员外郎赵载，司门员外郎刘墀并为如京使，左拾遗刘庆为两京作坊使，开为崇仪使，知宁边军。”

后徙全州，移知桂州，又知环州、邠州、曹州、代州、忻州、沧州，皆颇有政绩。如淳化三年（992）知邠州时，“时调民犂送趣环、庆，已再运，民皆荡析产业，转运使复督后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开贻书转运使曰：‘开近离环州，知刍粮之数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蚕农方作，再运半发，老幼疲敝，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罢，开即驰诸阙下，白于上前矣。’卒罢



之。”此事甚得民心。又如公元998年，宋真宗赵恒即位加开如京使、命知代州时，柳开感到朝政日败，契丹日侵，冗官充斥，人情贪竞，同僚互倾，“仁义之风荡然不复”，乃上言皇帝，要求惜用贤臣，“能立新法乃显神机”，表现了他的革新政治的进步愿望。后改忻州刺史时，契丹犯边，柳开又上书，“请车驾观兵河朔”，从而表现了他的“精求至治”、忠贞不渝的报国品格。

咸平四年（1001），柳开徙沧州时，“道病首疡卒，年五十四”。

柳开多才多艺，能文工诗，“善射，喜弈棋”。有《河东先生集》十六卷存世。他尚作《家戒》千余言，刻石以训其子。其诗作有散佚，今集中仅存三首。宋人江少虞编《皇朝类苑》卷三五引《倦游杂录》录其《塞上曲》一首。又，清人厉鹗编《宋诗纪事》卷二录三首，除重出者外，尚有《楚南楼》一首。共计五首。

二、柳开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活动

柳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是他首倡了宋初的古文运动。

这次古文运动，是旨在反对晚唐五代以来远离社会斗争和绮靡浮泛的骈体文风以及宋初兴起的“嘲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赋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它对北宋诗文创作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个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开创、发展和完成三个阶段。自公元10世纪70年代起至10世纪末，是运动的开创阶段，柳开作为此次运动的先驱者，他首先奋起倡导恢复“古道”，先从理论上打开了缺口；与此同时，另一位先驱者王禹偁，则以其平易晓畅的诗文创作，与颓靡的文风相抗衡；加以穆修、高昉、梁周翰、范杲等文友们的配合鼓吹，适应了宋初士大夫崇尚“淳古”的社会思潮，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古文运动才过渡到以欧阳修为主盟的发展壮大的阶段中去。



柳开为什么要倡导古文运动？

首先，这与柳开的“精求至治”、忠贞报国的志向有关。他希望文章应该有益于封建政治教化，要“以言化之”，“垂教于民”（《河东先生集·应责》）。

柳开对北宋初年的社会政治及其积贫积弱的形势趋向，有着清晰的了解和深刻的体验，社会时代的危机感促发了柳开在文学上的革新主张。他在知代州向真宗上言中曾列述了内忧外患的种种弊害，可谓骇人耳目，发人深省。从外患来说，柳开认为：“西鄙今虽归明，他日未可必保”，因为“西鄙积恨未泯，贪心不悛，其下猖狂，竟谋凶恶，侵渔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预备之”。从内忧来看，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冗官充斥，“职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则依旧，别无利害”，加以京府大都，不能“选委亲贤。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长，但令优逸，无以试材”，又不能“择文武忠直之士，为左右赞弼之任”，结果造成“虚费于利禄”，而朝政日坏。最令柳开痛心疾首者，乃社会之堕落、道德之沦丧，这使他沉痛难当：“又人情贪竞，时态轻浮，虽骨肉之至亲，临势利而多变。同僚之内，多或不和，伺隙则致于倾危，患难则全无相救，仁义之风，荡然不复……”柳开为此甚至大声疾呼，要皇帝“爱惜忠直之臣，体察奸谀之党！”

面对着这样内忧外患的可悲现实，作为载道工具之“文”，却背道而驰，“犹仍五季余习，镂刻骈偶，渙溷弗振”（《四朝国史，欧阳修传》，见《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四）。西昆体“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剗铍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石介《怪说》中）；其文作甚至“求本于饰，故为阅玩之具，竞本而不疑，去道而不耻，淫巫荡假，磨灭声教……”（见赵湘《南阳集》卷六《本文》）。这便使坐卧难安的柳开抱着“见义不为非勇也”（《河东先生集》卷六《送陈昭华序》）的态度，举起了韩愈、柳宗元恢复古文传统的旗帜，誓死宣传“道统”与“文统”的合一。特别强调文章应宣扬沿续一千余年的六经儒道，辅助教化，



为大宋一统天下的现实政治文化服务。

为此，柳开还将古文、今文的异同作了一番比较和考究：“文取于古，则实而有华；文取于今，则华而无实。实有其华，则曰经纬之文也，政在其中矣；华无其实，则非经纬之文也，政亡其中矣。”（《答臧丙第二书》）柳开一方面考较了古、今文的“政在”和“政亡”的原则差别，从而高度肯定了“古文”在治国安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他还在《上王学士第四书》中，充分表述了自己“厚古”而“薄今”的思想倾向：“始于心而为若虚，终于文而成乃实，习乎古者也；始于心而为若实，终于文而或乃虚，习乎今者也。习古所以行今，求虚所以用实，能者知之矣，不能者反是。”柳开的“厚古薄今”论，在当时具有合理因素，因它背谬了宋初文坛的虚华趋向而具有着独到的创见性。他批判了晚唐五代以来所形成的今文之“虚”，在于它抛开了古人为文之道的“实”的传统。古文的“实”，在于它能够施教化、明道统、“古其理、高其意”，而为现实政治服务。古文家认为，今文的“好对切事，声势景物，哀上浮壮”以动人的主旨，是虚辞华表，是感情虚假的表现。为此，柳开又在《答臧丙第三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我本非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将以文矜伐于古之道也；
矜伐于古之道也，则务将教化于民。……若以文矜伐于今之
人也，则不在于古之文也，在于今之所尚者之文也，轻浮侈
靡，张皇虚作，苟从时欲，求顺己利。

从此可以看出，柳开鼓吹光复古文之“实”的努力，几乎是不遗余力的。

柳开这种“复古”、“尊道”的主张，无疑是对宋初士子文人“浮轨滥辙、相迹而奔”文坛的一次沉重打击，它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政治斗争、文学要有思想内容，起到了一种标新立异、匡正除弊的积极作用。也正是由于柳开的这种自强不息、奋力图新的进取精神，才使他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者。

那么，柳开又是怎样倡导古文、他的“复古”、“尊道”的具



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韩琦《尹公墓表》（《河南先生集》附录）云：

文章自唐衰，历五代，日沦浅俗，寝以大散，本朝柳公仲涂始以古道发明之。

这里所谓的“古道”，即柳开易名时所谓的“将开古圣贤之道……达于孔子者也”，亦即儒家思想之道。柳开还进一步明确解释他的主张道：“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应责》）为“古文”，就是为了要发明“古道”，所以他接着说：“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同上）

柳开的这种“道统”和“文统”合一之说，实际是出自韩愈。因为韩愈一身而二任，“道”与“文”兼倡并导，这最适合柳开“复古”、“尊道”的口味。韩愈在其《原道》篇中曾说：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就是柳开“道统”说之所本。韩愈又在其《答陈生书》中说：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在《答李翊书》中说：

……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

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

这就是柳开“文统”说之所本。因此，以“肩愈”命名的柳开，他的整个文学活动、全身心所倾倒并为之奋斗不息的，就是宣扬韩愈所倡导的这种儒家道统。他虽然曾把韩、柳并列（并曾把柳宗元看作是自己的祖先），均作为他所尊崇和继承的偶像，但他心目中实际崇尚的却只是韩愈，而对柳宗元却明确说过：“吾祖多释氏，于以不迨韩也。”（《河东先生集》卷二《东郊野夫传》）

这样，就牵扯到对韩愈道、文合一论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即牵扯到柳开在宋初首倡古文运动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局限的问题。

众所周知，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他的“文以载道”和文道合一思想，曾对文章的言之有物



和给散文以比较自由的表现形式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但他又是儒家道统的极力鼓吹者，认为“文者，贯道之器也”（见《昌黎集》附录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这就给散文的创作套上一条无形的枷锁。儒道作为封建政治统治的思想体系，它的社会内容虽不能一概否定，有其关心现实政治和“民本”要求的一面，但它总的思想趋向却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其保守落后、唯心主义的糟粕较多。文学是要有社会思想内容、要为“道”服务的，但文学究竟要为什么样的“道”服务？并怎样为“道”服务？韩愈没能正确解决这一创作本质要求，他所倡导的“文以载道”说，却涉及到文学理论中最根本性的问题。其一，文学作为一种观念性事物，它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物质生活，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文学决不能以作者头脑里固有的“道”所规定，而只能来源于客观的社会生活及其本质规律。韩愈把观念性的“道”当作第一性的事物，甚至把“道”局限在更加狭小的儒道、六经的抽象教义之中，这就直接违反和颠倒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束缚了文学发展的手脚，最后势必导向脱离现实生活的道路上去。其二，文学为“道”（政治）服务，是按照自己的特点去服务的，即作家要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并通过艺术形象去做真实的描写，借助艺术形象的思想倾向性和感染力去影响读者，在精神世界中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忽视这个本质特点，只能把文学当成宣传“道”的简单工具，甚至当成“儒道”教义的传声筒，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本身。韩愈提倡“古道”，在纠正齐梁纤弱文风方面的功绩是不朽的，苏轼也曾盛赞他“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但是，由于他耽潜于儒道，他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这就使他时而忘掉强调反映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规律性，致使他的散文产生了一些宣传封建道德、伦理制度乃至追逐功名、应酬阿谀、歌功颂德的庸俗文章，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把古文运动的航标引向了歧路。这也正是韩愈难以再把古文运动再深入开展下去的关键性原因。



柳开作为一个以韩愈之道自肩、以韩愈之文自任的“尊韩”者，他的理想、抱负和文学主张，是与韩愈一脉相承的。柳开对韩愈文章酷爱至极，“日夜不离”（《河东先生集》卷十一《昌黎集后序》），并要“见义勇为”、“纵我穷饿而死，死即死矣”（《应责》）的自我牺牲精神去宣传韩愈的儒家道统观。因而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所做出的成绩，柳开并有之；而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所滋生的某些弊害，柳开也则亦步亦趋，甚至有所发展。

柳开在《应责》一文中，对“古文”的内涵，下了如下一个定义：

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

柳开这里所言的“高其意”，是针对晚唐五代以来浮靡绮丽文风而言，这与韩愈“文道合一”的主张所发生的积极作用相似，其创变意义不可低估。柳开所说的“非有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也就是要学习、继承韩愈等开创的勇于摆脱陈言俗套，随语言自然音节以自由言志状物的文风，这曾使柳开在推崇韩愈的雄奇奔放、曲折多变、流畅明快的写作风格过程中，使自己的文章努力效法韩文的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结合的风格，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柳开所言的“虽言长短”，更是要继承韩愈所津津乐道的汉以前散体文的写作风格，要抒写自由，汪洋恣肆，语言上长短不拘，活泼多变，这对讲求词藻华丽、声律谐和、对仗工整、淫巧浮侈的“时文”文风，自然是当头棒喝。柳开还特别看重韩愈文风古朴自然、不矫揉造作的特征和语言简练、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并竭尽全力鼓吹韩愈的平易文风和博大精深的语言功底。这些无疑都对宋初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柳开在其文论中所言的“古其理”，却正是韩愈所孜孜以求的“古道”，其具体内容即“道德仁义”等封建伦理观



念——韩愈的“学古道”，在这里形成柳开“古其理”的前身。再者，柳开所规范的“同古人之行事”，亦即像韩愈那样要求文人墨客必须效法儒家的先哲贤达，即要仿效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和“道统”，使文章为封建教化服务，最终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归宿。

柳开同样也把“道”看成目的，把“文”看作手段。他在《上王学士第三书》中这样说道：

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

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

柳开把文章比做“为道”的工具（筌），捕鱼的工具不好，鱼（道）也就跑掉了。柳开又把“道”与“文”的关系比做女子的“德”与“容”，女子应该“不恶德之厚于容”，也就是说，道是内容，文是形式，内容的重要远远超过形式。由此，柳开得出结论说：“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也就是说，“理”（道）是主要的，而文是次要的，“辞”不能华于“理”。柳开为了反复强调他的“文以明道”说，又在《应责》中，形象地把“道”比作“海”，把“文”比作浮“海”之工具，工具必须无条件地为“道”服务。柳开这些论点，与韩愈终生实践不辍的“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的“文以载道”说息息相通、心心相印。这也正是《河东先生集》中几乎所有文章都体现了道统神韵精神的主要原因。柳开在其《论高铈下第序》中还强调说道：“时之将来也，吾道行之；时之不兴也，吾道去之。”（《河东先生集》卷十二）从这种俨然理想抱负之言辞上来看，柳开简直把儒家道统的兴衰成败看作是关系封建一统天下的兴亡盛衰的大事了。

再进一步看，柳开在鼓吹和宣扬儒道方面，实际上要比韩愈走得更远。他甚至搜索枯肠，达到了强调儒道六经是决定文学创作道路的源泉的地步。因为柳开所谓的“绍复先师夫子之道”